

澳大利亚背靠背剧团及 对“能力主义”的思考

作者 / 李霞



坎普纳格尔国际夏季艺术节（Kampnagel Internationales Sommerfestival）每年八月在汉堡举行，为期三周。自 80 年代中期艺术节成立以来，它一直被誉为欧洲最重要的艺术节之一。其主会场是坎普纳格尔，一家位于旧工厂内的剧院，是全德国最大的独立表演艺术制作场地。自2013年起由安德拉斯·西博尔德（András Siebold）担任策展人和艺术总监。2022年国际夏季艺术节的项目囊括了从澳大利亚到南非的 250 多位艺术家的舞蹈、戏剧、表演、理论、视觉艺术和音乐。艺术节的宣传手册中提到，在如今反乌托邦的现状下，其坚持的信念是世界主义、批判性话语和对未来的愿景。对于戏剧来说，质疑社会规范和构建批判性话语是其创作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中来自澳大利亚的背靠背剧团就完美体现了这一点，并于今年9月荣获国际易卜生奖，用委员会的话来说，他们“始终如一地挑战社会观念和文化结构”，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戏剧艺术。

本文将重点关注背靠背剧团（Back to Back Theatre）及其代表作品，并对当今的能力主义社会进行反思。



Image © Jeff Busby

背靠背剧团

背靠背剧团是澳大利亚当代最受全球认可和尊重的剧院之一，也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文化输出团体之一。新冠疫情以前，每年都有近半年的时间进行全球巡回演出，甚至在疫情持续的2022年，它的巡回演出时间也超过18周。2009年至2022年，剧团参与了72个国内演出季和89个国际艺术节的演出，包括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维也纳艺术节、荷兰艺术节、东京艺术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艺术节等。获得了21项国家和国际奖项，包括澳大利亚赫普曼奖、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先驱天使评论家奖、纽约贝西奖和国际易卜生奖等。

自1999年以来，在布鲁斯·格拉德温（Bruce Gladwin）的艺术指导下，背靠背剧团培养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该剧团由一群被认为有智力障碍的演员组成，截至2022年10月，背靠背剧团的5位演员为马克·迪恩斯（Mark Deans）、西蒙·拉赫蒂（Simon Laherty）、莎拉·梅恩瓦林（Sarah Mainwaring）、斯科特·普莱斯（Scott Price）和布雷安娜·德莱奥（Breanna Deleo）。在2014年剧团的年度总结中有一行醒目的介绍，“我们是一个由残疾人组成的团体，制作戏剧，困扰世界。”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创作出挑战戏剧、社会和政治惯例的杰出作品。《吃苹果的女士》（Lady Eats Apple）、《美食广场》（Food Court）、《小金属物体》（Small Metal Objects）、《加内什与第三帝国》（Ganesh versus the Third Reich）和《猎物成为猎人的影子》（The Shadow Whose Prey The Hunter Becomes）等都是极具挑战性和变革性的作品。

除了戏剧实践外，背靠背剧团还开展社区项目。如《速度剧场》（Theatre of Speed）是为智力障碍青年提供的密集工作和培训的环境。参与者与杰出的当代艺术家、音乐家、导演、作家和表演者合作，以提高他们在自我表达、协作和表演方面的技能。官网介绍道，“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制造麻烦和破坏，试图打破一切被认为可能的东西。”





《小金属物体》和《猎物成为猎人的影子》

此次在坎普纳格尔国际夏季艺术节演出的《猎物成为猎人的影子》中，背靠背剧团与残疾的话题正面作斗争，与观众进行了关于语言和身份的对话。在此剧中五个人组织了一次公开会议，发起了一场颇具争议性的问答环节，从无害的提问游戏到赤裸裸的生存之战，其中没有遗漏任何敏感话题。工厂化养殖、奴隶劳动、人权和自动化带来的社会影响，都被逐一涉及。莎拉说道，“我们被视为二等公民，过度用药，就业无望，像动物一样被规训。”残疾人“被遗弃在森林里、被绑在床上、被实验、被隔离、被非人化、被绝育和被安乐死。”都揭露了残障群体长久以来被商业、政府和宗教机构长期虐待和剥削的事实。格拉德温则表达了身为残疾人的困惑和挫败感，如表达无法被理解，需要忍受无尽的药物和治疗，目的就是变得接近“正常”，而“正常”的基准就是白种人、男性、顺性别、异性恋。直到人工智能的话题开始，转折发生了。在一个人工智能主宰的世界，目前所谓的“正常人”在智力和身体上都无法与之竞争，于是他们“就像一只鸡或者火鸡”“或者是残疾人”。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即一旦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力，“正常”人将被视为与现在的智力障碍人士一样低等。

这迫使我们进行思考，当今社会是能力主义的社会，将非残疾人视为“正常”的标准，而这实质上是偏见和权力。当我们将人划分为“正常”与“非正常”，划分为三六九等时，我们需要知道总会有人超出我们的极限，没有人能无法完全拥有对自己身体的权力，无形之中我们会沦为一定程度上的“非正常”，成为能力主义的牺牲品，毕竟没有人知道能力主义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没有人知道最终的“正常”的标准会是怎样。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无法独善其身，我们都有责任。

而此前的一部作品《小金属物体》也在警醒人们能力主义的危险。其叙事背景是一场毒品交易陷入僵局。史蒂夫和加里是毒品贩子，同时也是两个被认为有智力障碍的人。财产律师艾伦和人力资源心理学家朋友卡罗琳想为将要参加的法律颁奖典礼弄到价值3000美元的可卡因。但史蒂夫正陷入生存危机，他有一些想要解决的情绪问题，在这之前他不想去储物柜里取可卡因。交涉过程轻易揭露了残疾人，生产力较低的人是如何不被尊重的。身为城市成功人士的艾伦和卡罗琳在说话的方式上带着咄咄逼人和居高临下的审视，当史蒂夫不愿交易时，就被评论为“被吓坏了”，被质疑“精神稳定吗”。交易破裂，卡罗琳显示出居高临下的愤怒，咒骂史蒂夫是“没用的狗屎”。在交涉过程中，“一切都有价值”被多次提及。当交易陷入僵局时，艾伦提出提高价格，卡罗琳提出提供心理咨询和性，而史蒂夫都拒绝了。或许金钱，服务和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有价值的，但对史蒂夫来说却缺乏吸引力。

Image © Jeff Busby



L-R: Sarah Mainwaring, Scott Price, Mark Deans, Michael Chan, Simon Laherty



Image © Jeff Busby

“我失去了一样东西，我无法存活”，“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是我的任务。我希望人们看到我。我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一样阻碍他存活和成为完整男人所缺失的东西是什么？是尊重和尊严吗？在如今能力主义盛行的社会背景下，能力和生产力定义了一个人的价值，决定了他是否能获得尊重，决定了他是否是一个能被看到的人，一个完整的人。残疾人、失业者、外来者、第三世界等这些传统意义上被认为生产力较低的人，早就承受着不被尊重、歧视和不公。但它越来越与社会中的每个人相关，当一个社会奉行能力主义，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会成为无形的战场，贫富、学历、性别等都在定义一个人的价值，矛盾和分裂不断滋生，作为赢家的少数精英群体可以享受尊重和傲慢，而普通民众难以避开不被尊重和屈辱感。能力主义也在侵蚀人们的大脑，让他们将一切不公归咎于自己的无能，而不是在社会结构中寻找问题。或许现在或者将来，你我也会被视为无能之人，在苦苦寻求尊严和尊重的过程中陷入存在危机。（完）